

新華半月刊

XIN-HUA BANYUEKAN

要 目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十四届会议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的声明

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印度武装人员侵犯中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且进行武装挑衅的声明

李富春同志在工业劳模座谈会上提出工业、交通、财政战线今后三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庫茲涅佐夫 10 月 20 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发言

1959 21

稿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关于工业战线群众运动.....	柯 庆 施(1)
粮食战线的辉煌成就.....	沙 千 里(5)
十年来的金融事业.....	曹 菊 如(10)
飞跃前进的我国体育事业.....	荣 高 棠(13)
爱国卫生运动的辉煌成就.....	徐 运 北(17)
胜利十年.....	柯 庆 施(19)
把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举得更高.....	刘 子 厚(24)
伟大的成就和灿烂的前景.....	陶 鲁 旂(28)
建国十年来的内蒙古自治区.....	烏 兰 夫(35)
伟大的十年.....	吳 德(37)
庆祝胜利,继续跃进,为建设更加繁荣幸福美丽的黑龙江省而奋斗.....	歐 阳 欽(40)
用实际行动保卫党的总路线.....	張 德 生(44)
十年战斗 十年巨变.....	張 仲 良(44)
辉煌的十年 伟大的将来.....	孙 君 一(4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进的十年.....	賽 福 鼎(60)
欢庆十年成就 迈向灿烂前程.....	舒 同(63)
高举总路线的光辉旗帜继续跃进.....	惠 浴 宇(61)
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曾 希 圣(68)
沿着胜利的道路奋勇前进.....	江 华(69)
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吳 芝 圃(73)
巨人的步伐.....	王 任 重(75)
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張 平 化(77)
保卫党的总路线 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	楊 尙 奎(80)
欢呼建国十年的伟大胜利.....	陶 鑄(83)
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奋勇前进.....	刘 颻 勋(88)

增产节约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李 大 章(92)
高歌猛进.....	周 赤 萍(96)
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光辉胜利.....	張 国 华(99)

· 政 治 之 部 ·

最高国家机关

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	班禪額尔德尼·却吉坚贊(101)
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議問題的发言.....	陈 毅(10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議的決議.....	(104)
刘少奇主席任命丘会作为总后方勤务部长.....	(104)

关于西藏問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十四届會議通过所謂“西藏問題”的非法決議的声明.....	(104)
班禪額尔德尼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举行的万人大会上說联合国无权干涉我国内政.....	(105)
反对美国加剧“冷战”(人民日报社論).....	(107)

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

偉大的友谊 偉大的团结——在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講話.....	宋 庆 龄(108)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吉洪諾夫在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講話.....	(110)
中苏友谊万古长青.....	錢 俊 瑞(112)

对外关系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大团结万岁!——庆祝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建交十周年 (人民日报社論).....	(114)
刘少奇主席在欢迎道比主席宴会上的講話.....	(116)
道比主席在宴会上的讲话.....	(117)

朱德委員長在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扩大的联席會議上的講話·····	(117)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道比主席在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扩大的联席會議上的講話·····	(118)
道比主席在告别宴会上的講話·····	(121)
刘少奇主席在道比主席举行的告别宴会上的講話·····	(121)
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	(122)
反对美日軍事同盟和保卫远东和平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人民日报社論) ·····	(123)
日共中央主席、日共代表团团长野坂参三同志向日本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說·····	(126)
中国革命和日本人民的斗争·····野坂参三	(126)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七团体同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代表团共同声明·····	(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印度武装人員侵犯中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且进行武装挑衅的声明·····	(1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联合公报·····	(1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34)
祝賀中国和几内亚建交 (人民日报社論) ·····	(135)
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电賀几内亚共和国国庆·····	(135)
周恩来总理电賀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一周年·····	(135)
周恩来总理致电恩開卡塞姆总理·····	(136)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法尼亚爭取独立斗争·····	(136)
中共中央电賀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36)

· 經 济 之 部 ·

工 业

李富春同志在工业劳模座談会上提出工业、交通、財貿战线今后三大任务·····	(137)
力争提前十天到十五天完成今年工业生产计划 (人民日报社論) ·····	(138)
提前超额完成 1200 万吨鋼 (人民日报社論) ·····	(139)
冶金工业部召开电话會議决定采取六項措施确保提前实现全年生产指标·····	(141)
祝包鋼出鉄 (人民日报社論) ·····	(142)
祝武鋼出鋼·····人民日报評論員	(142)
薄一波同志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召开的电话會議上的講話·····	(143)
薄一波副总理在全国煤矿职工广播大会上的講話 (摘要) ·····	(145)

基本建設

让重点工程提早投入生产 (人民日报社論) ·····	(146)
----------------------------	-------

· 文化之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开幕词.....	(14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闭幕词.....	(149)
在胜利的基础上稳步前进 (人民日报社论)	(150)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打破世界、全国纪录最高成绩表.....	(151)
四十名打破过世界纪录、夺取过世界冠军的男女运动员光荣受奖.....	(153)

教 育

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 (人民日报社论)	(154)
党的教育方针在高等学校的胜利.....	赵 守 一(155)

科 学

十年来中国技术科学的发展.....	严 济 慈(158)
-------------------	------------

· 国际之部 ·

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电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16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首都各界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63)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第一副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马特恩在首都各界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6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在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167)
周恩来总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举行的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168)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堡垒.....	威廉·皮克(169)

国际关系

金日成和諾沃提尼发表的联合公报 (摘要)	(173)
澤登巴尔、桑布和諾沃提尼发表的联合公报 (摘要)	(173)
胡志明和薩瓦茨基就波兰代表团訪問越南发表的联合公报 (摘要)	(174)
薩瓦茨基訪問朝鮮的联合公报 (摘要)	(174)
薩瓦茨基訪問蒙古的公报 (摘要)	(175)
華盛頓的死魂灵	人民日报評論員 (175)

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會議

苏联代表团团长庫茲涅佐夫 10 月 6 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會議上的发言 (摘要)	(176)
庫茲涅佐夫 10 月 9 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員會上就裁軍問題的发言 (摘要)	(177)
庫茲涅佐夫 10 月 12 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會議上的发言	(178)
庫茲涅佐夫 10 月 20 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會議上关于所謂“西藏問題”的发言	(179)
國內外大事記	(183)
报刊參考資料索引	(186)

新華半月刊

XIN-HUA BANYUEKAN

要 目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十四届会议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的声明

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印度武装人员侵犯中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且进行武装挑衅的声明

李富春同志在工业劳模座谈会上提出工业、交通、财政战线今后三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庫茲涅佐夫 10 月 20 日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发言

1959 21

稿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关于工业战线的群众运动

柯庆施

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是党的一贯方针。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走群众路线。他常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经常要我们记住，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不论是在阶级斗争中，还是在生产斗争中，我们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坚决地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并且同群众完全打成一片。只要我们能这样做了，那就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都不能压倒我们，而只能为我们所压倒。我们的党，正是依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认为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革命和建设的一切任务都必须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的路线。

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彻底地解放社会生产力，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者是社会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强有力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历史不断前进、社会不断更新的需要。解放社会生产力，首先是解放广大劳动者，打破那些束缚广大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的枷锁，扫除那些阻碍广大劳动者发挥智慧和力量的障碍。而群众自己的枷锁，只有依靠群众的双手去打破；群众自己的幸福生活，也只有依靠群众的双手来创造。所以，不论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都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制定革命总路线和建设总路线，并且把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实现总路线的基本方法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所提出来的革命要求。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的这个要求。在这条总路线的引导下，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逐步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生产力从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党深切地知道，长时期遭受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痛苦的中国人民，具有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强烈愿望。他们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中，又表现出冲天的干劲。

有一位老工人说：“从前是这双手，现在还是这双手，可是现在干得多痛快、多有趣呀！”劳动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不是为剥削阶级而是为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劳动，就必然要打破一切常规，按照革命的速度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一九五八年春天，党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这种强烈愿望。

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强烈的革命意志是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足的。他们把搞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看作是一个不关紧要的问题，好像建设速度快一些或者慢一些，是可以由“我们”来随便决定的。他们竟忘记了一条真理，就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始终是决定历史的前进方向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人民当了社会的主人以后，六亿五千万人民要办的事，谁也阻挡不了；六亿五千万人民不要办的，谁也办不成功。这是一条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现时的条件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恰当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只有贯彻执行这条总路线，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我们党内对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特别是在工业战线上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问题，曾经发生过不少争论。有的人说什么“在革命斗争中可以搞群众运动，在建设事业中决不可以搞群众运动”；有的人说，现代工业极其复杂，只能建立一套所谓“正常秩序”，不能搞群众运动；有的人说，工厂企业中的政治改革可以搞群众运动，技术改革要按按部就班的“科学方法”，不能搞群众运动，如此等等。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要用一套所谓“正规化”的方法，来代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路线，用单纯的行政命令来代替生动活泼的群众运动。他们并且把自己的一套办法叫作“正常”、“科学”，叫作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把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常”、“不科学”、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谬论，有些是由于认识模糊，有些是由于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但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引向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错误道路。事实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说得对：“按照来自上面的命令不可能组成社会主义。官僚文章是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生气蓬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本身创造的物。”就是，革命的群众运动才是最正常的革命创

序，最科学的领导方向。而那些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们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他们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搞群众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因为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依靠六亿五千万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试问，不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靠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呢？靠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应当懂得，依靠群众还是脱离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还是不搞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分歧点，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无产阶级路线和其他非无产阶级路线的根本分歧点。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路线。建国以来，我国工业战线上出现过三次生产高潮，这就是1952年、1956—1957年的增产节约运动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这三次高潮，都是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的伟大产物。这三次高潮，一次比一次高涨，1958年以来的高潮尤其特别高涨。这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愈来愈深刻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愈来愈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我们定不断地揭露和批判了各式各样的右倾观点，总结了我国多年来领导生产建设的经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跃进。

实践业已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但完全适合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而且由于党的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就能自觉地、及时地调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更有力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以后，由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它能够促使生产力以旧社会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速度发展；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我们一小部分干部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作风，企业管理中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若干障碍，因而它又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常常处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中。这种不相适应的部分，就使得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在一定时期内会受到压抑，成为前进的障碍。如果不扫除这些障碍，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当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种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的，只能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逐步解决，从而把社会的发展引向繁荣的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这是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法的过程。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

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要随之不断地进行革新，这是推动生产力不断高涨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所阐明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原理，从思想上武装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使我们看清了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道路，并且确信这是保证社会生产力不断跃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是我们大搞群众运动的有力的理论根据。这个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一九五八年以来，上海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一系列的正确的指示，通过群众运动，及时调整了生产劳动中人和人的相互关系，首先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及时地调整了工业企业生产管理制度中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劳动人民解除了精神上的束缚，敢想敢说敢做，无所畏惧而向腐败的资本主义风格便发扬起来了。因而就使科学生产关系不断完善，更加促进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无比的高涨，掀起了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的热潮，使生产跃进有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有如千军万马，锐不可挡。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继续跃进的情势下，原来怀疑大搞群众运动的人，为群众意气风发的情势所鼓舞，在运动中受到了教育，认识到大搞群众运动是高速度的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而积极投入到这一火热的运动中来；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锻炼，长了见识。这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出现，使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受到一次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教育。“千条万条，党的领导第一条；千计万计，群众路线第一条。”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体会。特别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上海各级党组织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问题，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快到什么程度，首先取决于党的领导，取决于党是否能够正确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大大地发掘群众的潜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充分地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历次指示，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我们摸索到和积累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在工业企业中大搞群众生产运动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是必须抓紧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领导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从来就是党的领导方法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好，对于工业企业开展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有决定性影响。根据上海的经验，解决领导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整风精神，正确地处理工业企业中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调整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地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是生产者又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翁。企业领导人员同职工群众的基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分工不同，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时侯角度不同，有时就不能趋于一致，或者不能完全一致。又由于一部分干部沾染了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习气，不善于用说服教育方法来处理间

題，因而，就妨碍了群众对这部分领导人员的充分信任，也妨碍了一部分工人用主人翁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劳动。经过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这种相互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领导干部丢掉官气，放下架子，带头参加劳动，种“试验田”，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第一线去解决关键问题，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同群众打成一片，成了新的风气。在相互关系改善的基础上，领导方法也有了新的转变。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能够全面关心群众的思想、工作、生活和学习，不仅关心先进群众，而且关心中间、落后群众。他们能够充分信任群众，坚决依靠群众，认真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用“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向群众提出明确的战斗目标，讲清形势和任务，理由和方法，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进行深入的思想发动，使群众提高认识，了解全局，发挥主人翁的积极性，把企业的生产计划变成自己的行动纲领，为完成企业生产任务而奋斗。应当说，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这种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

但是，一次整风并不能一劳永逸。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对干一年多以来党的许多正确措施，至今在思想上仍然有所不通，甚至搬出一些错误观点来对抗。有的人说：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务正业”，是“付出太高昂的代价”。在他们看来，领导干部的天生的“正业”就是站在上面发号施令，而关心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同群众打成一片，则是根本不需要的。这是一种经济工作脱离政治的最有代表性的错误观点。还有人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应当参加劳动，工人出身的干部根本没有必要，这当然也是错误的。整风以来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不论他们的出身如何，如果不能经常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生产劳动，就不可能很好地领导生产、管理企业。到群众中去，“就派了”一些坐办公室的时间，其实这才叫真正的务正业，秉“官”业。这决不是“付出高昂的代价”，而是尽领导干部的本份，获大跃进的丰收。工人出身的干部，如果长期脱离生产，也比较容易脱离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对他们同样重要。为了使我们的广大干部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旺盛的战斗的意志，最重要的就是一刻也不失掉同群众的联系。正像一位纺织工人在今年初在一张大字报上所写的，“整风运动是结束了，整风精神不能丢掉。”这位同志的满腔热情的话，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继续用整风的方法，使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同志互助关系进一步发展。不少单位也确定坚持了整风精神，整风时期的一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运用，整风、务虚会经常进行，促使广大干部经常警惕自己，密切联系群众。不少党委书记和厂长，经常出现在生产薄弱环节和最困难的地方，同那里的职工共同商量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在今年夏天高温季节，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到高温车间参加生产劳动，大大地鼓舞了群众战胜困难的积极性。有一些原来整风精神一度松弛下来的干部，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又跑到现场去办公，到最困难的部门去工作了，群众表示热烈欢迎，说是“大跃进又来了！”

整风的方法，不只是有效地改善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有效地改善了职工之间、车间之间、工厂

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现薄弱环节的共同目标下，互相支援、互相促进、互通经验、互通有无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大大发扬。为了保证重点建设和产品配套，大家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相关的厂、组、车间、科室，互相支持，主动配合。上述工作为下道工序服务，上一班为下一班创造有利条件。这种你帮我的协作精神和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情结合起来，促进了群众生产运动更顺利地蓬勃向前发展。

第二，为了开展工厂企业的群众运动，必须把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这是去年群众运动实践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由于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内容，也是生产大跃进的关键，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在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中，某些关于工具、设备、操作方面的改革，是广大工人群众可以独自解决的。但是，重大的技术关键，新技术的钻研，重要的创造发明，往往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单靠技术人员或者单靠工人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采取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办法，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个道理，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了，而且创造了许多有效的结合形式。上海电机厂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使二万五千瓦汽轮发电机的生产过程缩短工序有革新，制造周期压缩再压缩，从八十一天缩短到二十天。他们还组织了千人大战斗队，攻克四大技术难关，突破了許多薄弱环节，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有些同志把科学技术神秘化，迷信少数技术专家，迷信书本，瞧不起工人群众的劳动实践经验，不去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一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中也存在自卑心理，精神上受到束缚。其实，一切科学技术都来源于生产实践，直接参加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具有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的创造力量。正像恩格斯所说：“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①大跃进以来，破除了人们的这种对于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广大群众发扬了敢想敢做敢为的大无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刻苦钻研的毅力，工人群众的心情是：“走，坐，坐，坐，想，革新技术心不安。”过去认为难以办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过去经过几次几次失败的试验，终于实现了。事实也证明，熟能生巧，充分集中群众在生产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不仅是对工具改革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改善产品设计，也有重要的意义。群众中的革命首创精神，同时也教育了技术人员，他们提出：“在实践中锻炼，与生产共命运，同工人心连心。”他们在现场和工人一起共同讨论，共同试验，共同设计，共同创造。由于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就更充分地发挥了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也使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感性知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这种技术人员和工人互相结合的方法，是互相学习的过程，不只是有利于解决生产的关键问题，而且使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同时得到提高，是培养工人阶级技术人员队伍的一个重要方法。

第三，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广大职工的思想不断地得到解放，敢想敢做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断地得到发扬。这样，也就势必要冲破原有的各种不合

理的規章制度的束縛。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工廠企業中，做好企業管理工作，必須有必要的行政命令和規章制度，沒有必要的而且必須為全體人員所嚴格遵守的規章制度，我們的生產就沒有辦法正常進行，我們的生活秩序就沒有辦法維持。這是一種極其普通的常識。那種認為可以不要規章制度的思想，正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反映。但是在我們社會主義的工廠企業里，科學的規章制度是反映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應該成為領導和組織生產運動的有效工具，組織和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的工具，成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工具，而不應該成為妨礙群眾發揮積極性和妨礙生產發展的工具。由於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要求上層建築同它相適應，也就不可能有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規章制度。因此，問題的實質在於：我們是熱烈地支持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呢，還是死抱住原有的已經變成為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不放呢？在大躍進和繼續躍進中，廣大群眾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來改變各種規章制度，對不利於生產發展的障礙，對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建立，規章制度的破樹立新，是生產發展中的正常現象，也促使為經濟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隨著生產發展不斷健全完善。

有的同志死抱著過時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不放，以為這樣才可以便於加強企業管理。可是，事實和他們的願望恰恰相反，企業管理水平是一定要隨着生產的發展而逐步提高的，不改變過時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企業管理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加強。也有的同志總想有一個不變應萬變的規章制度，好一勞永逸、平平靜靜地過日子，這樣他們就可以不要去操心操心了。他們總是責怪群眾，「剛劃好的規章制度，又被你們打亂了」，「什麼辦法才是最後一個運動呢？」情況在不斷變化，有什麼辦法可以制定出萬古不變的規章制度呢？革命者應該來迎變革，因為，這種變革所帶來的不是利，而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大發展。所以，領導人必須採取堅定的態度，支持革新者打破舊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同時又通過群眾建立新的合理的規章制度。這樣，我們的工廠企業的面貌就可能不斷地刷新，群眾運動就可能不停頓地向前猛進。在過去一個時期內，有的單位破除了某些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是正確的；但是沒有及時地建立新的合理的規章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有右傾保守思想的人就抓住這個缺點，要求立刻恢復那些已經破除了的制度。這顯然是不對的。對這個問題，如同對一切問題一樣，都應當採取分析態度。同時，不論是破樹立新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還是建立新的合理的規章制度，都必須走群眾路線。有某些人企圖在建立新的規章制度的時候，不經過群眾，都是一定要失敗的。我們的一切規章制度，既然是為發展生產服務的，而群眾的創造性又是發展生產的最強大的動力，我們就應當也能把規章制度變作促進而不是阻礙群眾首創精神的工具，使我們的規章制度和群眾的首創精神結合起來。

第四，在大躍進和繼續躍進中，不是幾個人、幾百人、幾萬人，而是幾十萬、幾十萬人廢寢忘食、不計報酬地為創造幸福的新生活而鬥爭，這個事實證明了黨對職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質鼓勵相結合的

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黨內曾經有過一些同志，片面地夸大物質鼓勵的作用，而忽視以至否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巨大作用。他們忘記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思想狀況怎樣，對他的生產勞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響。而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必須依靠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來完成。我們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義務使一切可能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階級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使廣大群眾真正具有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高度熱情和遠大的理想。任何削弱政治思想工作的思想和行為，都必然削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陣地。這是決不允許的。這當然不是說，可以忽視對群眾物質利益的關心。我們認為，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物質鼓勵是需要的。我們現時的分配制度必須是按勞分配。我們在工作中，不僅要關心群眾的生產、工作、學習，還必須關心群眾的物質福利，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大」關心的物質生活逐年有所改善，並不斷地健全企業的工資和獎勵制度。但是，這一切工作都必須和政治思想工作相結合。沒有堅強的政治思想工作，單靠物質鼓勵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很容易走向反面，瓦解和激發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這長個人主義思想。群眾的政治覺悟的提高，才是最可靠的、牢固的、持久的動力。因此，在群眾運動中，我們必須全面地關心群眾的生活，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又必須繼續不斷地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人民群眾，使他們不僅關心個人的眼前的利益，而且要關心集體的長遠的利益，正確地處理這方面的人民內部矛盾。對人民群眾的先進分子，首先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更應當給他們發揚不計報酬的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帶領廣大群眾為實現建成社會主義和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鬥。

上面說的領導人員和廣大群眾相結合，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相結合，合理的規章制度和敢想敢說敢幹的共產主義風格相結合，對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質鼓勵相結合，關鍵在於黨的領導。要使這三方面結合得好，必須加強黨的統一領導。對人民群眾的自覺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最根本的保證，把「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出來，是黨組織的應有的任務。也只有黨的統一領導下，才可能把群眾發動起來，充分發揮群眾的覺悟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并使群眾運動堅持下去。要實現這個任務，決不是工廠內其他任何組織所能代替的。當然，這決不意味着可以忽視其他組織的作用。在企業行政管理上，採取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是黨中央早已確定了的，應當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工會、共青团等組織，過去在教育職工和組織生產中已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今後仍然應當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它們各自的更大的作用。

我們工業戰線上的群眾運動正在日益高漲。這個運動使我們實現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正在實現一九五九年的繼續躍進。上海工業總產值，今年一到九月累計，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十七點一，已經完成國家規定的全年計劃的百分之七十三。十月份以來，增產節約的浪潮繼續高漲，產量質量繼續上升，躍進速度繼續加緊。根據目前生產水平計算，完全可以肯定，今年的國家計劃一定可以大大地提前完成。

和超额完成。今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完全可能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实现了这个指标，单是今年净增的产值，就相当于一九四九年上海工业总产值三十亿九千万元的两倍以上，而一九四九年的总产值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才达到的。每一个愿意承认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基础上的继续跃进。每一个愿意承认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承认：我们党的总路线完全正确，因而具有巨大的威力。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在去年以来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我们一定能

够把更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成绩上来。虽然群众运动总是波浪式地前进，每年的跃进速度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群众运动将会一浪高一浪地汹涌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经常地持久地保持跃进的局面，这是肯定无疑的。

① 马克思：“哥尔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② 恩格斯：“致平·施塔尔肯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04页。

〔“红旗”1959年第21期〕

粮食战线的光辉成就

粮食部部长 沙千里

粮食问题，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旧中国被称为贫困与饥饿的国度，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之下，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以后，只有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中国人民才能逐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十年来，我国粮食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粮食分配也建立了一套合理的制度，因而保证了城乡人民粮食的基本需要，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并且正在使人民生活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加美好的境地。

建国十年来，我国粮食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1949年到1958年，粮食生产按总产量计算，增长了一点三倍，平均每年递增了9.8%；按人口平均计算，几乎增长了一倍，平均每年递增7.5%。像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更不是旧中国条件下所能梦想得到的。

1949年，建国的第一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这是新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土地改革的胜利，由于党和政府领导的大力倡导，到1952年粮食产量就达到三千零八十八亿斤，比1949年增长42.8%，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逐步实现，粮食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到三千七百亿斤，比1952年增加19.8%。1958年和1959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农村人民公社发挥了巨大的优越性，五亿多农民干劲冲天，意气风发，粮食生产继续跃进。1958年提前四年达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2年的粮食生产指标，粮食产量达到五十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增加了35.1%，这是我国粮食生产史上没有前例的特大跃进。1959年，我国不少地区遭受严重的旱、早、虫、风等自然灾害，但是全国的粮食产量仍将达到五千万亿斤左右，即在1958年特大跃进的基础上再增产10%左右。粮食生产的连续跃进是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胜利，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胜利，是五亿多农民向自然索取粮食的斗争的胜利。

旧中国不仅粮食生产水平极低，而且粮食分配也

极不合理。据推算，那时，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攫取了一千亿斤左右的粮食，平均每人有粮食二千斤左右；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劳动农民也仅仅占有一千多亿斤粮食，平均每人不过二百多斤。一方面是陈谷满仓，囤积居奇；一方面是饥肠辘辘，饿殍载道。解放后，随着地主阶级的消灭，粮食分配上的畸形状态也彻底消灭了，粮食生产的增长就意味着消费的增長。

旧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是国内粮食严重不足，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每年都有粮食进口。若干沿海城市，主要食用洋米洋面。1933年粮食进口达六十亿斤之多。即使如此，广大劳动人民仍然终年难得一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51年已经做到国内粮食自给，并且还有一部分余粮出口，用以换回国家建设所急需的机械设备。尽管我国目前余粮不多，出口数量不大，但是在这样短暂的时期内，由不足一变而有余，谁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呢？

我国粮食生产飞跃发展和消费状况显著改善，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谬论。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就胡说什么中国人口太多“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压力”，预言没有一个政府有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上的成功。帝国主义御用的新黑尔萨斯主义者也断言，粮食的增长决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事实是怎样的呢？我国人口在1949年是五亿四千八百七十七万人，到1957年增加到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八年间共增长19.7%，平均每年增长2%；而同一时期，粮食生产增长71%，平均每年增长7%。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还没有新的统计材料，但可以肯定，这两年粮食生产增长的速度要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更多。在铁的事实面前，帝国主义的宣传家显得十分尴尬，近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不得不改变腔调了。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是为了吃饱了，不过他们又说：党和政府给人民吃饱是为了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呀！这些恶毒的诬蔑，而对于我国人民兴高采烈、意气昂扬地从事粮食生产，对我国粮食状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事实，再也不能欺瞒了！

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吃饭大事已经得到了可靠的

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我国目前的粮食产量,同人民日益增长的要求来说,还是很不丰富的。我们的目标是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彻底解决粮食问题,要以最丰富的粮食最充分地满足社会的各项需要,更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到这一点。1958年和1959年粮食生产的连续跃进证明,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人民公社的粮食生产是可以高速发展的。这就为加速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不用很久,我国粮食产量一定可以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1967年的指标。到那时候,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上对粮食的需要,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远大目标就更接近了。

十年来粮食生产的迅速发展,给粮食的分配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发展生产是彻底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因为归根到底是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生产高度发展了,粮食大大丰富了,社会对粮食的各项需要才能最充分地得到满足。同时,合理分配可以使生产出来的粮食充分发挥效用,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粮食生产的增长赶上需要的增长的情况下,实行合理的分配去调节粮食的产需矛盾,更具有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一建立,国家即以巨大力量调剂粮食供求,稳定粮食市场。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稳定了波动十二年之久的粮食价格,从而安定了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为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由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和工矿区人口迅速增加,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也在扩大,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国家担负的供应粮食的任务大大加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生活不断提高,自己消费的口粮逐年增长,牲畜家禽的饲料也逐年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商品粮食的增长赶不上需要的增长的形势。那时,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私营粮食商业兴风作浪,进行粮食投机活动,更加扩大了商品粮食的供求矛盾,甚至开始影响到粮价的稳定。为了保证城乡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家从1953年秋季起,实行了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也就是统购统销政策。

粮食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它一方面用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统一的粮食市场代替了粮食自由市场;另一方面由国家直接深入到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按照一定的定额和合理的价格,有计划地收购和销售粮食。这样,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为害人民的粮食投机活动,把粮食的分配完全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

从1953年以来,政府每年根据国家供应粮食的需要和粮食生产发展的情况,通过农业税征收实物和粮食统购工作,掌握了大批的粮食。1953—54粮食年度(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征收和统购的总数是八百四十六亿斤(包括大豆,以下同),比1952—53年征收和收购到的粮食五百五十五亿斤增加了二百九十一亿斤。以后各年统购数字随着生产的发展略有上升,1958—59年度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征购粮食一千一百一十三亿斤。从1953—54年度到

1958—59年度这六年中间,平均每年征购九百一十四亿斤,占同期粮食平均年产量22%,如果扣除销回农村的部分四百零六亿斤,实际从农村购出来的粮食平均每年五百零八亿斤,占平均年产量的15%。

由于国家掌握了大批粮食,就能保证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保证人民生活的根本需要,保证了人民的体力和健康,使人们干劲十足地进行生产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随着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城镇人口很快地增加起来,1950年全国城镇人口只有六千多万,1953年增加到七千八百万,现在已经是一亿以上了。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对商品粮食的需要量也增长了。国家供应城镇粮食的数量是十分巨大的。1950年全国城镇粮食零售额不过五百五十五亿斤,1953—54年到1957—58年五年间国家供应城镇的粮食数量,每年平均就有四百二十亿斤,1958—59年增加到五百五十四亿斤。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以分等定量、保证需要为原则,居民的口粮定量标准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劳动的需要规定的,是够吃的。此外,国家对城镇的饮食业用粮、工业用粮(如酿酒用粮)和一些饲料用粮也都根据实际需要保证了供应。这样就有力地直接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

灾区的粮食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旧中国,无论哪个朝代,凡是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地区,人民总是要流离失所,妻儿离散,饿殍载道,有的甚至易子而食,景象惨绝人寰。严重的灾情总是引起生产萎缩、田园荒疏的后果,所以有灾必有荒,“灾”“荒”两个字结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方面领导群众大办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举办各种防灾救灾事业,积极防灾抗灾,从而大大减轻了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在灾情发生以后,又以极大的努力,向灾区供应粮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灾区的粮食约有三百亿斤。在1954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水灾,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国家运到灾区的粮食就将近一百亿斤,供应灾区的粮食,都用可能的最快的办法运送到灾民手里。遇有水灾特别严重,交通一时断绝的情况,党和政府还派出飞机大量空投粮食。灾区人民说是“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千年未有的好政府”,称颂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救命政策。国家支援灾区的粮食,常常是从很远的地方调运来的,全国各地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一盘棋思想指导下,把地方的余粮调运出来。例如1956年河北发生大水灾,国家调入河北的救災粮三十多亿斤,很大部分是从四川调来的,运费自然很高。但国家为了照顾灾民困难,仍按河北当地粮食价格供应灾民,运费由国家补贴。试问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政府呢?由于国家千方百计保证了灾区的粮食供应,再加上灾区人民自己的努力,就完全做到了灾而不荒,使灾区生产仍然能够正常地向前发展。

国家不仅保证了城镇和灾区的粮食供应,而且对三千万万左右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对大约二二百万从事林业、牧业、渔业、盐业等生产的人口,以及农村其它缺粮农民,也一定保证了他们所需的粮食。国家供应农村(包括灾区)的粮食数量,从1953—54年到1958—59年的六年间每年平均是四百零六亿斤。

这对于保证工业原料的生产和农村多种经济的发展，对于保证农村少数缺粮户的粮食，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这里看出，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本质上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征购”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配给”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从人民利益出发、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它给人民带来了生活的安定和幸福；反动统治者的粮食政策是从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出发、以剥削人民为目的的，它给人民带来的是贫困、饥饿和死亡。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新中国的统购统销制度不仅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对促进农业合作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把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利用粮食进行投机的道路堵死了，在粮食流通这一个重要领域里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削弱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加强了社会主义对农民的影响。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于实现私营粮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建国初期，虽然国家一开始就通过农业税的征收和市场的收购掌握了大批粮食，建立了集中而又相当强大的国营粮食企业，但私营粮食企业仍占相当大的比重。1950年私营粮食工商业在全国粮食零售总额中占三分之二左右，在收购总额中占一半左右，在粮食加工业总产值中占78.3%。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它的比重已逐渐缩小。1953年冬季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营的粮店和粮食加工厂分别成为国家粮食部门的代购店、经销店，和完全接受国家委托加工的工厂。1956年资本主义粮食工商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又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实行了定息制度。私营粮食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在改造私营粮食企业的过程中，私营粮食加工厂的从业人员大多数转为国营粮食企业的工作人员，其他少数人也都得到了国家的妥善安排。

社会主义粮食业在同资本主义粮食业斗争中壮大了自己。现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粮食系统已经拥有近百万的职工（包括粮食加工工业的职工），拥有遍布全国城乡的机构；十年中，它还扩建和新建了能够容纳九百多亿斤粮食的仓库和每年能生产一百一十四亿斤面粉、五百四十亿斤大米的粮食加工厂。这就是说，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体系。新中国的粮食企业是我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廉洁、最有效率的粮食企业。这里不仅有旧中国粮食机关和私营粮食业中专以贪污盗窃、哄抬粮价为能事的“米蛀虫”“粮老虎”，而且不断创造出粮食工作的新成就，其浪费损耗之低，调运效率之高，加工成本之低，以及对消费者服务的周到等等，都是旧中国粮食企业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十年来粮食工作保证了人民的粮食需要，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有理由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粮食工作是执行了党的总路线的，粮食战线上的胜利是党的总路线胜利的标志之一。

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所提出的从

全国六亿多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在过去和目前适用，而且在今后也将长期适用。毛主席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在粮食分配工作中对于毛主席这个指示特别亲切、特别深刻。全国六亿多人，每天都要吃饭，才能进行生产劳动和其他正常活动，一天没饭吃就会发生问题，就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从六亿多人出发，而不能只是从某一方面某一局部出发，是粮食分配的基本前提。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实行这样的原则，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粮食分配工作能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能够有效地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就是说，既要照顾国家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既要照顾城市、工矿区等方面的需要，又要照顾农村缺粮户、经济作物区、渔民、牧民等方面的需要；既要照顾生产者的利益，又要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特别注意这样几点：第一，统购粮食的数量必须适当，统购粮食的数量不能太少，界限总不能少于国家最低限度的需要，统购的数量也不能太多，界限总是要给农民留下必须的口粮、饲料、种子，不能“过头粮”。几年来统购粮食（包括农业税征收实物的部分）平均占粮食总产量27%，如前面所说扣除调回农村的部分，实际运出农村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5%。也就是说，留在农村为农民食用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绝大部分，即85%。事实证明这样的比例一般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兼顾了国家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的。第二，统购粮食的数量要在一定的时期内相对地固定下来，统购粮食的数量要适当控制。为了鼓励农民积极增产粮食，国家对粮食有余的农民按照农民自己民主评定的产量，把征购粮食的数量大体固定下来，几年以内基本不变；对缺粮的农民每年确定一个固定的供应数量。如果农民受灾减产，要相应的减少统购数量或者增加统购数量；农民增产的部分只购40%，其余60%留归农民自行处理。这就是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办法”。这样农民增产越多，自己留用的粮食就越多，既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增加民间储备。这种办法自从1955年实行以来，大受农民欢迎，国家也有了稳定可靠的粮食来源。粮食统购数量相对地固定下来以后，有计划地安排粮食销量，就成为保持国家粮食收支平衡的决定条件。因此，国家1956年在农村实行粮食“三定”办法的同时，在城市也实行了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有效的控制了城乡的粮食销额，从这个办法实行之后，也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减少了浪费粮食的现象。第三，粮食的供应要恰当地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从1953—54年到1958—59年，国家销售的粮食情况大体是：供应农村缺粮户的粮食（包括经济作物区、灾区 and 一般农村的少数缺粮户）占46%，供应城市居民的粮食（包括粮食业用粮和一小部分工业用粮）占49%，出口粮食占5%（出口粮食占粮食产量1%多一些）。这个比例对于过去几年的情况一般是适合的。当然，今后供应农村缺粮户的部分要随着粮食生产的提高和缺粮户的减少而逐渐

縮小；供應城市的部分要隨著工業人口的增加而逐漸擴大；國家社會主義建設日益發展，某些國內還不能生產或充分供應的設備和原料，材料的需要也隨着增加，需要一定的外匯，同時也為了滿足兄弟國家和友好國家的需求，出口糧食也要有適當的增加。這些都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而定。第四，糧食的收購和供應都要堅持等價交換、公平合理的原则。我國的糧食統銷統購價格，是以1953年開始實行統購統銷前糧食自由市場的收購價格和零售價格為基礎確定的。在實行統購統銷以來的六年中，統購價格平均提高了2.1%，其中主要是適當提高了邊遠地區、山區、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糧食收購價格，對增加農民收益和改善他們的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糧食銷售價格則是完全穩定的，消費者為糧價的波動而時刻耽心的日子，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述了。國家又取消了糧食的季節差價，因此糧食春貴秋賤的不合理現象沒有了。農村糧食銷售價格同國道價格的差額一直維持在8%左右，這個差額只包括必要的經營管理費和少量稅金（同中國糧食商人為爭取暴利，賄賂劣價往往是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几百）。總之，在糧食統銷的數量上，在糧食統銷的安排上，在糧食價格上，處處要從全體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的糧食工作所以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正是因為做到了這一點。

在糧食分配工作中，國家不僅要對商品糧食進行有計劃的分配，並且要對農民的糧食消費，進行積極的指導。農民是糧食的生产者、所有者，又是消費糧食最多的糧食消費者，他們糧食消費是否安排得好，對國家的糧食調劑具有很大的影響。過去幾年，糧食分配問題往往是在農村，解決問題往往也是在農村。幫助農民安排好糧食消費，是糧食工作取得成就的重要關鍵。

在糧食分配工作中，還必須作到瞻前顧後，以丰补歉。這就是說，糧食的消費應當細水長流，留有余地，提倡節約，增加儲備。大家知道，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不能完全避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糧食生產有時還受到各種自然災害的襲击，造成丰歉不平衡的現象。由於我國領土廣闊，即使在全國說來是丰收的年頭，也總有一小部分地区受災。如果丰收的地区消費的過多，歉收地區的糧食供應就會受到影響；丰收的時候如果消費多了，歉收的時候就會感到困難。因此，在丰收的年頭和丰收的地区，國家應當適當的多購少銷，增加儲備，在今後一定時期內，每年增產的糧食應當盡量用於增加必要的儲備，用於增加節約。這樣才能把國家、公社和農民的必要的糧食儲備逐步建立起來，才能把糧食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增加肉食和肥料，促進生活的改善和生產的發展。十年來，我們在城鄉居民中提倡糧食節約，指導人民有計劃地消費糧食，特別是着重安排農村統銷工作，幫助農民作出用糧計劃；並且從秋收一下來就抓緊節約，秋多抓緊節約，第二年春又下日子就好過，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的經驗。

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瞻前顧後，以丰补歉，這就是要求我們勁過日子，精打細算地過日子。毛主席告訴我們，在一切革命和建設工作中，在戰略上要藐視困難，在戰術上要重視困難。我們糧食工作必須

認真貫徹這種思想。在戰略上，我們完全有信心迅速增加生產，經過努力，使糧食極大的丰起來；在戰術上，在實際工作中，則必須兢兢業業，勤勤克克，不浪費一粒糧食；必須在增產的基礎上，按照黨的政策努力多購一些，適當控制銷量，盡量增加儲備。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地保證六億多人民的糧食需要，才符合六億多人民的最大利益。

十年來的經驗證明，要保證糧食工作的勝利，必須以政治為統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必須堅持黨的總路線，堅持社會主義的糧食政策，不斷同資本主義勢力和資本主義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毛主席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糧食問題是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糧食問題總是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戰綫上是反映得很深刻、廣泛而尖銳的，糧食問題常常成為兩條道路鬥爭的焦點。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极其重要的工具，是黨的總路綫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切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無不反對對糧食統購統銷，一切對社會主義道路有所動搖的人，也經常在糧食統購統銷問題上發生搖擺。這種情況說明了糧食戰綫上的政治工作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放鬆的。

糧食問題上兩條路綫的鬥爭，從新中國建立一開始就明顯地表現出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前，小農經濟自發勢力和自由市場同國家的計劃經濟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這種矛盾在1953年和1955年兩次緊張的鬥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了。1953年，正當我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開始的時候，資產階級主義力量勾結起來，以拒售余糧，製造黑市，破壞國家收購等方式，擴大糧食的供求矛盾，製造糧食困難，企圖阻撓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黨中央和毛主席及時地分析了當時的情況，指出這不僅是經濟上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矛盾在糧食問題上的集中反映；因此，斷然決定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堅決地從糧食流通領域中把資本主義因素排除出去，並且發動全黨在全國人民中間大張旗鼓地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綫，启发和引導農民自覺地放棄資本主義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自發勢力的發展。廣大的勞動人民首先是工人、貧農和下中農，堅決支持黨的糧食政策，打退了城鄉糧食投機分子。這樣，不僅克服了當時的糧食困難，而且把糧食的分配納入了社會主義的計劃軌道。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後，糧食戰綫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并未結束。當時除了資本主義的富農經濟以外，廣大個體農民還沒有經過農業合作化的社會主義改造，富裕中農仍然有恢復自由市場的活動。1955年春來，某些地方曾經出現過的鬧糧風潮，主要就是農民特別是富裕中農這種小私有者的心理引起來的。當時，社會上一些反對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乘機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另外一小部分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堅定的人也搖搖不定，隨聲附和。毛主席和黨中央正確地分析了當時社會主義的性質，指出要不斷鞏固糧食統購統銷就是要不要社會主義的問題，肯定必須堅持糧食統購統銷；同時也指出糧食工作中的一些缺點，決定在農村中把每年規定統購任務的辦法改為糧食“三

定”的办法，在城市中把凭证供应的办法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办法。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1955年在全国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教育运动。这样，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的力量不仅很快地改善了粮食局势，而且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进一步发展了。

1956年，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国内市场上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那么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没有。斗争还在继续着。在所有制问题上肃清胜利的障碍解决之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存在着长期的、反复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十分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粮食战线上来。1957年和1959年的两次斗争就是明显的例证。1957年春季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作为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叫嚣为什么“统购统销搞错了”“购得太多了”，企图挑拨党与农民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并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一次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办法，帮助农民认清了粮食问题的本质是非。经过这场辩论，农民进一步认识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不仅迅速地完成了国家的粮食统购任务，而且鼓足了冲天的干劲，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1958年大跃进和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人们缺乏在那样特大丰收的情况下过日子的经验，在秋收以后浪费了一些粮食。在一小部分灾情特别严重的地方，今年春天一度出现过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些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但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们非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非难人民公社和非难大跃进中，又企图利用这件事作文章。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保卫总路线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在胜利地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也统一了对粮食问题的认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总结了在新的形势下怎样过好日子的经验，号召“农村各人民公社要普遍注意把粮食管好，用好，对粮食、薯类、瓜果、饲料、燃料等的生产和消费，要根据有备无患、细水长流的精神，作好长时期的统筹安排”。经过深入的宣传教育，这个号召已经为全国广大农民所接受。这样，就使整个粮食工作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这样一条道理：政治能够出粮食。政治挂帅可以使农民战足干劲，增加粮食生产；也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做好各方面的供应工作。粮食工作首先是一项政治工作。某些人认为“政治不能出粮食”的观点早已被事实驳倒了。

十年来，粮食征购任务都是靠大搞群众运动来完成的。这种群众运动以向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而在粮食分配方面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为中心内容，以最好地完成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根本目的。而总起来讲，严重的斗争在于教育农民。群众运动首先是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去武装和发动群众，然后领导群众去战胜资本主义的损人利己思想和小农经济的狭隘自

私思想。粮食战线上不是只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判别尖锐的时候，如1953年、1955年和1957年，才大搞群众运动；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之后，每年夏秋两季在农村征购粮食和安排销流也都是全党动员，全力以赴，发动亿万农民大搞群众运动。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党和政府以农村的党员、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核心，坚决依靠贫农和雇农上升的下中农，通过他们向广大农民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在每次运动中，不仅向广大农民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使国家的粮食政策为广大农民所掌握，并且不断集中农民的正确意见和要求，补充和修改国家的政策措施。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办法就是在充分集中农民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历史宣传粮食政策又都是同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宣传工农联盟相结合的，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式，通过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等办法反复地进行爱国的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启发农民自觉地改造思想，积极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粮食的交售任务。所以，粮食战线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破资本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是农民群众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积极交售粮食，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这样，国家就不仅取得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需的粮食，并且巩固地团结了农民，使工农联盟更加巩固和发展。

在城镇中，无论贯彻粮食计划供应、定量供应办法和整顿粮销，也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在运动中，一方面对市镇居民进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一方面对市镇居民进行巩固工农联盟和反对浪费、节约粮食的思想教育。把粮食统销同工农联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个思想教育使粮食计划供应政策深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上亿城镇居民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地遵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粮食业务工作极为繁重。诸如在农村产品的核算，购销定额的详算和核定，粮食入库、加工和集运，以及核定城镇居民的口粮定量等级等等，无不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突击完成。这样繁重的业务工作，单靠粮食部门的职工是不够的。因此，除了在粮食部门百万职工中大搞群众运动外，还必须依靠亿万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去完成。把粮食部门百万职工的群众运动同亿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成为党统一领导下的整个粮食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几年来实践证明，粮食战线的群众运动不仅贯彻执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解决了大大小小的业务问题，并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大搞群众运动，走群众路线，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条真理，在粮食战线上反映得极为鲜明。这是粮食战线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光荣地度过了第一个十年，跨入了第二个十年，回顾过去，我们为已经获得的辉煌成就而欢欣鼓舞；展望未来，我们为灿烂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感到无限的自豪。我们深知未来的任务仍然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更充分发挥的过

程中，在大跃进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我们深信，粮食战线在新的十年中，一定能同其它战线一样，获得更

加辉煌的成就；

（10月25日“人民日报”）

十年来的金融事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曹菊如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现在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欢欣鼓舞，从各个战线上用更大的跃进成就来庆祝建国十周年。我国的金融事业，十年来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为贯彻党的总路线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

旧中国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长期统治下，金融事业也深刻地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到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的地区，金融市场处于一个极端混乱的局面：伪法币急剧贬值，物价疯狂上涨；金、银和外国货币充斥市场，成为金融投机的主要对象；官僚资本银行、帝国主义银行、私营银行钱庄成为市场上进行投机的核心；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不仅任意发行货币，而且还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清算，操纵中国的外汇价格，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这种情况使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这种情况给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苦和不安。全国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迅速彻底地肃清了伪币、外币和金、银的流通，严格取缔了金融投机，没收了官僚资本银行，摧毁了帝国主义银行的一切特权，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性质的金融体系。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为了稳定金融物价，给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造成有利条件，于1950年3月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即迅速地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物资调拨平衡、现金收支平衡。中国人民银行在贯彻这项决定中，坚决地实行了现金管理办法，把国家分散在企、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的大量现金，集中到银行来，同时把集中的大量资金，用来支持国营商业掌握物资，加强国营经济领导市场的物质力量，有效地打击了市场投机。在贯彻执行这项决定中，银行还迅速地建立了全国通汇网，便利国家资金的统一调拨和集中运用。这样，随着财政、物资平衡的胜利实现，金融物价迅速得到了稳定，根本扭转了反动统治造成的历时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财经战线上这一辉煌的胜利，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外的敌人，曾经断言，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胜利了，但是财经工作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可是事实如何呢？事实清楚地驳斥了敌人的诬蔑。中国人民在建国以后短短的时间里，就在财经战线上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胜仗。

1955年3月，由于生产不断发展，物价长期稳定，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人民币的計算单位，使市场交易更加便利；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发行新的人民币，用新币收兑旧币，收兑的比率是新旧人民币一元兑换旧人民币一万元，国家规定，持有人民币的人，不问阶级阶层都同样以一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人们换得新币以后，以一元新币能向市场买到相当于旧币一万元的物资。新人民币的发行，大大便利了交易和核算。我国货币制度从此更进一步健全和巩固起来了。

以1950年3月的物价为100，到1958年年底，全国批发物价指数是92.7%，八大城市的零售物价指数是101.4，这证明人民币的币值是长期稳定的。

我国人民币能够保持币值的长期稳定，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的产物，是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生产高速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的结果。

十年来国家的财政不仅保证了收支平衡，并且经常有一定的结余，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国家发行货币是通过银行的信贷渠道，根据生产发展、商品流通扩大和市场上季节性的变化，相应地投放或者回笼；国家在安排国民经済计划时，经常使消费品生产和供应的增长同人民购买力的增长相适应，这样就避免市场货币量过多或者过少的现象，保证货币的正常流通。

在大跃进的时期中，右派分子曾经说我们的人民币不稳定了，现在事实证明，和他们的诬蔑相反，我国人民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一样，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所有资本主义的所谓强国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它们的通货膨胀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从美元数起，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在不断地贬值，难道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吗？

在经济恢复时期内，银行根据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私营银行和钱庄，一方面实行了严格的行政管理，限制其投机活动，另一方面在国家银行领导下，疏导其资金，使之用于正当工商业的放数；并且逐步组织它们联合放数，联合经营业务。“五反”运动中，私营钱庄被揭发出大量违法投机活动，它们赖以生存的由违法投机活动所造成的市场虚假繁荣，已经不存在了，它们在社会上吸收游资、调剂资金的作用日益缩小，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市场的领导作用则日益加强。以吸收储蓄和私营工商业存款为例：1950年6月到1952年12月，两年半中间，国家银行所占比重由58.6%上升为92.8%，私营银行和钱庄所占比重由41.4%下降为7.2%。私营银行和钱庄在这时期内普遍亏损，极其困难，已难继续存在。适应这一情况，国家于1952年12月对私营银行钱庄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组成公